



20世纪
现代汉语语法
八大家

邢福义选集

季羨林 / 主编

萧国政 / 编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RSHISHIJI
XIANDAIHANYU
YUFA BADAJIA

季羨林 / 主编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邢福义选集

邢福义 / 著

萧国政 / 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邢福义选集/萧国政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6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ISBN 7-5602-2851-8

I. 邢… II. 萧… III. 汉语-语法-研究-文集
IV. H1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6365 号

出版人: 贾国祥

责任编辑: 吴长安 封面设计: 李冰彬

责任校对: 陈鸿瑶 责任印制: 栾喜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5695744 5688470
传真: 0431-5695734

网址: <http://www.nnup.com>

电子函件: sdch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40mm 1/32 印张: 19.5 字数: 499 千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序

季美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黎锦熙选集》、《王力选集》、《吕叔湘选集》、《胡裕树、张斌选集》、《朱德熙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以年龄为序)。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无愧。此举实有对 20 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学术发展潮流、应乎业内学人心声之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

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可一旦被人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 19 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 20 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 100 年的研究历程作出总结。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备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博”的典型。我们这套《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则另辟蹊径，先划定一个学术领域，结集一百年中业内“大家”之经典著述，既对20世纪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达到的高度予以总结和概括，又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搭了一架“大师级”的人梯——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的“专”的典型。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但是，我有一个特点——优点，缺点，尚难断定——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学，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三年前《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序中。我那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语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尤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师在六十六年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

今日印欧语系谓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

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组,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

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模仿印欧语系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仿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套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扩展汉语语法学的眼界,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我也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力求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如果把汉语与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深入下去,语言学的成绩将更大。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 100 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

- (一)套用期:19 世纪末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
- (二)引发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70 年代末期;
- (三)探求期:70 年代末期—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探求

期)大约已 20 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下面邢先生又说道:“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 21 世纪的任务。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得太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 21 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1999.06.29

邢福义先生评传

萧国政

—

1935年阴历五月三十日,即当年阳历6月30日,邢福义先生出生于海南岛乐东县黄流乡。黄流在海南岛南端,往东数十里海边有一石崖,便是著名的“天涯海角”。黄流人说的是海南闽方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1946年7月,邢先生上黄流第二初级小学,读四年级;接着,1946年9月—1948年7月,在黄流中心小学读书;1948年9月—1949年2月,在海南崖县榆亚中学读书;1949年9月—1952年2月,在海南崖县初级中学读书;1952年8月—1954年7月,到海南北部的海口市,进入海南广东琼台师范学校学习;1954年9月—1956年7月,到武汉市,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专修科学习,毕业后留中文系任现代汉语专业助教。

其启蒙教育,是坐在识字不多的爷爷腿上,听念《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完成的。从小学到大学,其中初小一年、高小二年、初中三年、中师二年、大学二年,整个在校的读书时间仅十年。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岁月,1956年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教之后,当了22年助教;“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从助教越级晋升副教授;1983年,晋升教授;1988年4月起,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现代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8年起,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深港澳语言研究所学术顾问兼咨询。

1999年3月,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以母语汉语为教学和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系,出任系主任。国内外包括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单位的许多语言学家来信祝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一封长信中说:“贵校成立语言学系,喜不自胜,逢人必道,闻者无不抚掌。”“此乃中国语言学将兴之征”,“语言学系自当大有作为”。

二

邢福义先生主攻汉语语法学,同时也研究逻辑、修辞、方言、文化语言学及其他跟语言学有关的问题。

最早发表的文章是《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中国语文》1957年第8期),当时22岁。截至2000年6月,已发表文章逾300篇;出版著作(包括主编的和与人合著的)30多本,其中个人独著11本。

1989年,所著《语法问题探讨集》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所著《语法问题发掘集》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所著《邢福义自选集》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所主编《现代汉语》获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998年,所著《汉语语法学》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又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1998年3月,澳门回归前夕,到澳门参加国际会议,会上宣读的论文后来获得澳门理工学院《理工学报》惟一的优秀论文一等奖,1999年8月在德国汉诺威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期间正式接受获奖证书和奖金。以“澳门理工学院供稿”的名义发表的报道说:“邢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其成就与贡献有口皆碑。他的论文见解独到,对目前和今后的汉语教学与测试颇具指导意义。此次获奖,实至名归。”(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78页)

其语法研究,可以概括为五个着力点:其一,着力于隐蔽规律的发现;其二,着力于结合逻辑研究语法事实;其三,着力于学术“据点”的建立;其四,着力于理论问题的思考;其五,着力于研究路子和研究方法的探索。

其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1956-1978),积累期。“文革”前,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7篇;“文革”开始之后,刊物停刊,但没有放弃问题的钻研。这一时期,主要是培养研究习惯,积累研究经验,铸造敏锐视力。代表性论文当是《关于副词修饰名词》(《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该文刚一发表,方光焘先生就于1962年5月强调“研究语法应该注意一般现象、特殊现象和个别现象的相互关系”,指出:“副词能否修饰名词的问题,张静认为副词能够修饰名词,他是想推翻已有的规律。而邢福义则是以特殊现象来作补充,指出了副词修饰名词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副词修饰名词必须具有一些条件。我基本上同意邢福义的意见,……”(方光焘《研究汉语语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2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二段(1979-1989),求索期。既有专著出版,又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这一时期,以复句为“据点”开展对汉语语法问题的研究,重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重视语法事实的深入发掘,重视隐蔽规律的揭示与刻画。最主要的代表作,当是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和《词类辨难》(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是邢先生一系列复句研究论文的第一篇。吕叔湘先生于当年9月28日给邢先生一信,信中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见《治学之道 学风先导》,《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文集》,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词类辨难》一书,不仅阐明词性判别的语法依据,而且从论证的角度总结出了直接判定、排他和类比三种办法,开始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的尝试。逻辑学家李先焜写道:“我特别推崇邢福义同志的语言研究工作。在吕叔湘先生为其《语法问题探讨集》所写的‘序’中有这么一句话:‘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认为吕先生这句话真是‘一语破的’。邢福义同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跟他善于运用逻辑方法去分析语言现象分不开(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点)。邢福义同志是专门研究过逻辑学并写过逻辑学著作的,因此在他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过程有意或无形中就使用了逻辑方法。……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进行逻辑语言学的探索。”(《论语言学与伦理学的结合》,《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第三段(1990-今),造型期。强调“研究植根于泥土,理论生于事实”。一方面,致力于事实的发掘,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方言,还有意识地把视线移向近代古代汉语;一方面,着力于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探索,总结出了“两个三角”和“小句中枢”等著名论点。脚踏实地的考察与理论方法的思索,形成良性循环,展示了具有“上向型”特色的研究造型,显现了有个性的研究风貌。最主要的代表性论文,当为《从基本流向综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中国语文》1992年第6期)和《小句中枢说》(《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最主要的代表性专著,当为《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即使是研究一个具体事实

的,也带有“上向型”研究线路的理论色彩。比如《“最”义级层的多个体涵量》(《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结尾处写道:“汉语的词汇词义的分析研究,应该同语法语用的分析与研究结合起来。……孤立的词汇词义层面的分析,只能获得最基本的了解;衔接上语法语用的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深入而全面的认识。这种接轨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并非‘最’字如此。”语法学家邵敬敏指出:“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明显的特点是开始摆脱盛行几十年的结构主义语法的影响和束缚,……在对大量汉语语法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更加适应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思路,其中胡明扬的‘语义语法’说、徐通锵的‘字(语素)本位’说、邢福义的‘两个三角’理论和‘小句中枢’说等都比较有影响。……”(《八十到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语法学家李芳杰指出:“近几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德熙的词组本位体系和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体系,他们各自不但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代表作:《语法答问》、《语法讲义》,《小句中枢说》、《汉语语法学》。”(《句型主体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语言学家许嘉璐副委员长论述道:“从50年代开始,黎锦熙先生语法体系的核心理论‘句本位’也同时受到了批评。同样地,在经过了40年后,这个问题也被重新认识。(李临定先生说)‘如果我们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那么它总是以句子作为基本单位进行交际的,语言的组织规律,即语言的语法,应该以揭示句子的组织规律为目的。……离开句本位来研究词组只是语法的不完全的部分的任务。’而邢福义先生的新著《汉语语法学》的第一章就是‘小句’,在该书《导言》中作者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汉语语法系统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以小句为中枢。’‘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邢氏所说的小句,包括了单句和复句中相当于或大体相当于单句的分句,这和黎氏当年的‘句本位’的‘句’所指基本相同。……邢氏在说到分句时加上了‘相当于或大体相当于’的限定,又比黎氏灵活而严谨。黎锦熙的‘句本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短语中心’说所代替。但是,近来后者引起的怀疑越来越多。从黎氏到邢氏,恰好盘旋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着往上走了一个圆圈。”(许嘉璐《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68—6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三

纵观邢先生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其基本的理论和主张,可以归结为5个方面17点。

(一)研究论——关于研究思路与研究要求的论说:

(1)“两个三角”。第一个三角为“表-里-值”小三角,主张表里互证,语值辨察;第二个三角为“普-方-古”大三角,主张以方证普,以古证今。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现象,“小三角”是内证,“大三角”是外证。

(2)“三个充分”。所谓三个“充分”,指的是“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两个“三角”是研究思路,三个“充分”是研究要求,二者互补互证,互为条件。国外学者关于三个充分的提法,可以引进汉语语法研究,结合汉语实际,对三者作配套性新解释。

(3)“两个沟通”。所谓“两个沟通”,一个是自然语言研究内部的沟通。语法研究,同词汇研究、语用研究、逻辑研究、文化学研究等应有接轨,尽可能地搞一些跨界性的研究。另一个是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研究的沟通。本体语法研究,应考虑计算机的需求,尽可能把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究结合起来。孤立的、单角度的、纯本体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也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4)“事实发掘与特色形成”。一方面,强调“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即: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强调追求独创性的研究特色,认为中国语法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之日,将是我国语法学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之时。

(二)总体论——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总体性论说:

(5)小句中枢。汉语语法系统,以小句为中枢。汉语语法重句

法,而不重词法,对于汉语语法规则的构成和显示来说,小句在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居于中枢地位。“小句中枢说”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以小句为中轴,以句法机制为重点,注重观察句法规则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

(6)小句三律。成活律、包容律和联结律,这是汉语小句的三条定律。了解小句三律,可以加深对汉语语法系统中小句的中枢地位的认识。小句三律的基本公式:

成活律1:句子语气+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小句成型。

2:句子语气+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意旨的有效表述=小句生效。

包容律1:小句-句子特有因素=短语。

2:小句-句子特有因素-短语常备因素=合成词。

联结律1:小句联结+小句分句化=复句。

2:小句直接间接联结+句子集群化=句群。

(7)动词核心和名词赋格。汉语里,各种复杂格式其实都是在此基础之上衍生或者变化出来的。名词赋格现象,包括单名占位赋格、单名移位赋格、双名同位赋格、双名移位赋格、双名隔位赋格等等状况,几乎涉及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研究清楚名词的语义特征,是解释清楚名词赋格有关规律的必要条件。

(8)句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趋简与兼容,服从于语用原则。二者互为条件:结构形式的趋简,导致结构语义的兼容;语义兼容的可能性,又提供结构趋简的可能性。这一特点表明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在结构形式上常用减法,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则常用加法。

(三)词类研究——对汉语词类问题的主要论说:

(9)词类问题的研究,需要有“两手”对策。第一手,揭示各个词类的基本特点和各个词儿的常规性质;第二手,给出词进入小句之后所形成的可以显示词性的种种格式。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必要的补足。光有第一手不行,讲少了不齐全,讲多了繁琐细碎,如果有后一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手的补足,就不怕前一手有什么疏漏。

(10)词性的判别,除了依据语法特征,还有必要采用“直判”“排他”“类比”等论证方法。语法特征情况多样,并不规整,而具体的词千千万万,情况错综纷繁。有的词语法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直接指明其词性;有的词情况相反,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说明类属。灵活使用证明方法,可以提高词性判别的有效性。

(四)句法研究——对汉语句法问题的主要论说:

(11)句式的组造,有其逻辑基础。从逻辑基础上考察句式,解释句式,是对句式进行语义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尝试把逻辑方法改造成为语法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句法语义的分析问题,会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2)汉语的动宾关系之复杂,在很大程度上跟宾语代入现象的复杂多样相联系。所谓宾语代入现象,指的是代体宾语代入常规宾语的位置的现象。代体宾语的形成,需要满足四个特定条件:有三角联系;提供新信息;不产生误解;有言语背景。

(五)复句研究——对汉语复句问题的主要论说:

(13)复句分类,从关系出发,用标志控制。按并列概念分类法,把复句划分为因果类复句、并列类复句和转折类复句,建构汉语复句三分系统,有利于理清各种复句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14)复句关系标志既有静态作用又有动态作用。从静态的角度看,作用在于“标明”;从动态的角度看,对于隐性的逻辑基础来说,作用有显示、选示、转化和强化四种。要深化对复句的认识,必须重视考察关系标志的动态作用。

(15)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进行反制约。复句格式直接反映主观视点,间接反映客观实际,复句格式一旦形成,便明确地限定它所标明的关系,便成为一种反作用于语义关系的语法框架。

(16)复句句式的多样性,既表现为句式蕴含的语义关系具有多样性,又表现为句式构成的联结形式具有多样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反映“双视点”的标志复现现象丰富多彩;“但”类转折词异常

活跃。

(17)复句和单句既有对立又有纠结。典型单句是单核句,典型复句是核同质、有核距、无共同包核层的多核句。纠结现象复杂多样,归总起来说,不外乎四种:一是多核而核异质;二是多核而无核距;三是多核而有共同的包核层;四是用了特定的关系词语。

四

在治学上,邢先生以三句话作为他的行为规范。

第一句:“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从80年代初开始,每届新生入学,不管是硕士生、博士生还是语言学系的本科生,他都首先讲这句话。他写了《抬头是山,路在脚下》一文,发表在《中师生报》第146期(1992年5月17日)上。他解释道: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眼睛要看着山,心里要想着爬山。但是,上山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踩开。山顶不易攀登,成功不靠侥幸。

他心目中的山是多峰峦的,对于某个具体的研究,他的追踪从来就没有过止境。一般来说,复句研究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他在《汉语复句研究》自序中写道:“越研究,问题越多,越有更多的糊涂。……晏殊《玉楼春》中有两句话,我改换了其中的两个字,说成:‘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学问无尽处!’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他还写道:“这本书,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但是,句号只意味过去,却不代表终结。句号放大是个0。往前又是0起点!”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早些年成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训,这两年又成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系训。

第二句:“猪往前拱,鸡向后扒。”

《海南日报》1996年6月3日发表过他的散文《根在黄流》。他写道: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喜欢挤在祖父身边听老人们“讲古”,漫说人生。家乡老人们经常慨叹着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意思是,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人总要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路。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影响了我的大半生。从这句话,我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首先,要拱要扒。拱和扒,意味着奋斗求生存,求发展。其次,猪只能拱,鸡只能扒。猪有猪的特点,鸡有鸡的特点,这决定了它们各有各的办法。如果鸡往前拱,猪往后扒,鸡和猪都活不下去。再次,往前拱和往后扒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怎么样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哲人们强调“扬长避短”,立意也是如此。

他只读过十年书,专科学历,不在名校工作,身边没有名师指引,背后没有菩萨引渡,每前进一步,都比别人多几分艰难,每前进一步都是依靠自己的摸索。但是他很“善师”。一方面他善师于方家。从50年代起,《中国语文》每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语法论文,他都要反复“悟道道”: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作者是怎样展开这个题目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由于经常如此坚持“偷学”,终于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众多高明的学者也就在“函授”中成了他的导师。另一方面,善师于自己。他有一个自己教自己的办法:有的文章写成后搁起来,过一段时间拿出来挑挑毛病改一改,再过一段时间又拿出来挑挑毛病改一改。有的文章的时间跨度,竟有三十年。如关于动词作状语的文章,1956年12月写一稿,1958年10月写二稿,1990年11月才定稿为《现代汉语的特殊格式“V地V”》发表。他说:我这是自己牵着自己走路。我属猪,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前拱!”

第三句,“年年岁岁,春夏秋冬。”

《海南日报》1998年11月22日发表过他的散文《年年岁岁 春夏秋冬》。

他写道:“春夏秋冬是个时间概念。春夏秋冬意味着一年有四季,四季有十二个月,十二个月有三百六十五天。做什么事,做一天两天,做十天半个月,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如此,这就不容易。这就需要坚持不懈,需要韧性和毅力。”1994年3月中旬,他应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撰写一部《汉语语法